

# 无声世界里做出“学术三部曲”

“

本版撰稿:本报记者陈席元

## 靠“化缘”做出第一版CSSCI

近年来,学术界涌进股股清风,从破“四唯”到破“五唯”,再到破除“SCI至上”,针对评价机制等方面突出问题,改革力度不断加大。

近日,教育部印发《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》,明确要求“十不得”,包括不得将SSCI、CSSCI等论文收录数、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、物质奖励、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,防止高额奖励论文等。

SCI即“科学引文索引”,有近60年的历史,其姊妹版SSCI就是“社会科学引文索引”,都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研制的文献索引系统,被全世界广泛使用。1989年,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”,这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,相当于“中国版SCI”。

1997年底,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(现信息管理学院)提出,要研制中国自己的SSCI。1998年,南大组建了苏新宁教授主持的项目团队,2000年5月,第一版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(CSSCI)》在北京发布。

从提出破除“SCI至上”、“五唯”,再到“十不得”,都意在打破学术界的“出身论”,以本领论英雄。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,苏新宁如何看待学术评价领域种种改革,CSSCI背后又有哪些故事?



▲2016年,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。 受访者供图

诞生。

## 意外进入无声世界,却成就学术上的“命运交响曲”

20年来,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、管理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政治学等在内的25个大类、500多种学术期刊。基于CSSCI平台,苏新宁也推出了中国人文社会学术、期刊、图书三份影响力报告,共计500多页。

2012年,苏新宁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这是国内情报学界首次有人入选。2014年以来,他已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今年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。他说,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当初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精力,更多把精力放在带领团队、培养新人上。

可谓功成名就的苏新宁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。一次手术意外,让正值学术壮年的他失去了听觉。

时隔多年,苏新宁仍清晰地记得手术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。

“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,打开水龙头,瞬间发现自己听不到水声了。”苏新宁赶紧让家人联系主刀医生,但对方已经休假外出,等假期后复诊为时已晚。

“当时是夏天,我就站在大太阳底下,看天空都是黑的。”苏新宁说,“听不见别人说话,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,对一名教师来说,这是致命的打击。”

除了绝对的寂静,还有无尽的耳鸣。“那感觉就像站在飞机发动机下面,原来耳聋不仅是听不见,还会有巨响。”那段时间,苏新宁曾冒出过“死了算,真不想活了”的想法,家人、同事、学生们心急如焚,大

乐曲。“无声世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,早上起来以后我会特意不戴人工耳蜗,虽然什么都听不见,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,没人打扰,别人打电话来我也不知道。”苏新宁说。

从2002年到2011年,整整十年,苏新宁最终完成了《中国人文社会学影响力报告》三部曲,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聪后完成的。时任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主编的龙协涛,把这些成果比作贝多芬的“第九交响曲”。

## 推动情报学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

今年11月,已经65岁的苏新宁第三次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。这次,他关注的是“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和发展研究”。他说,“是时候让情报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了。”

信息、知识、情报,三者的区别在哪里?天上有一块乌云,这是信息;如果你没有知识,只会觉得天空发暗,有了知识,就知道乌云意味着要下雨,但这个知识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很小。情报则是根据云层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会下雨,它和信息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辅助决策。这个“乌云说”,是苏新宁已经在课堂上讲了20多年的经典案例。

完成了学术三部曲后,苏新宁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学科的未来上。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,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情报学被评为A+,作为学院的首席专家,苏新宁感到,要推动情报学向更高层次、更宽领域发展。

其实,在我国高校,情报学关注的并不是军事情报,而是科技情报。

“科技情报曾对我国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苏新宁介绍,1956年,中科院成立情报研究室,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,恢复高考后,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招生,“那时候谈的都是科技情报。”

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,随着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,国内情报学界认为,要将情报拓展到信息的范畴,从以往研究各类科技文献,向信息情报发展,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1992年9月,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。

“在高校,图书馆学、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这些专业,已大多改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资源管理。1998年专业目录调整之后,情报学作为本科专业就没有了。”苏新宁说,如今,情报学界更多在做信息管理,很多本学科的青年学者,研究的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深度学习等,其实这些属于其他科学,“感觉就像自家人却种的是别人的种子。”

为什么现在要重提情报学?“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,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,对决策的辅助作用也变小了。我们不仅要有信息,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形成情报。”苏新宁说,“以前讲科技情报,以后情报要真正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服务,科技情报要和军事、安全、经济、生态、医学健康等情报融合,发展‘大情报’科学,增强情报学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。”

“我们最希望听到人家说‘这不可能’。200年前,有谁想到还能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天,谁又知道后来有了飞机、火箭?”苏新宁说,“不可能就意味着有可能。为国家做‘瞭望者’,这是我们作为情报学人的使命。”

## “不管用什么器皿,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”

# CSSCI“始作俑者”怎么看“破除SCI至上”

“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,与他人合作1到2篇,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10篇,有3篇以上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,2020年新发表的一篇论文,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联系我。”他说。

更严重的是,帽子、奖项、论文之间,形成了“赢者通吃”的利益联结关系。

一个团队需要有资深“大咖”,争取重点项目就更有希望,而有了项目背书,产出的论文才会被一些重点期刊接受。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资历尚浅,很难拿到重点项目,要么“抱大腿”,要么付出高额的版面费。

## 营造有自净能力的学术生态

本应苦心孤诣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界,近年却频频曝光功利化、学术不端等怪现象。苏新宁认为,主要问题还是出在“五唯”等学术评价的“指挥棒”上。

2017年,苏新宁在《学术评价与学术考核奖励机制的辩证观》一文中就写道,评价的目标是促进,不能让这种正向促进变成负面导向,把甘坐冷板凳的人变成学术上浮躁的人。

“科研管理不能简单化,不能机械套用很多不能评价成果的指标来评价成果,必须看论文内容有没有创新,学者有没有新贡献。”他坦言,近三十年来,学术界的评论家少了。“从论文数据库就可以发现,评述性文章少了,带有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,多的是总结性的综述文章。好像有一种‘不敢轻易批评和评价’的氛围,结果就是大家倾向于采用一些量化体系,比如SCI和CSSCI。”

苏新宁说,回首20世纪60至80年代,人文社科领域的定性评价一直是主流。“当时有一批正直的学术家能够直言,也没有那么多指标,当然了,学术成果也没有今天这么多,学科交叉也不像今天这么多,现在有数字人文,把人文和技术、管理结合起来,评价的难度提升了,很多专家的知识都不能完全覆盖。”

一些学者获得院士或“长江学者”等“学术帽子”以后就开始坐享其成,鲜有新成果问世,而部分企业、地方还热衷设立院士工作站,虽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来指导几次,但动辄要数万至数十万元。

苏新宁对记者讲了自己所经历的“唯帽子”案例。

“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的关系要控制好,不能像企业那样搞物质奖励,发一篇文章就奖励几万元,对科研工作者更多应当是精神奖励,要树立崇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价值取向。”苏新宁说,“这种和经济挂钩‘切蛋糕’的做法弱化了学术荣誉感,要从青年教师一代慢慢扭转,虽然他们确实生活工作很辛苦,但要从政策上另辟蹊径改善待遇。”

苏新宁说,总之要明确,学术评价绝不能仅用定量的方式,必须走出“排行榜”那一套,必须看学术成果对科学技术、对社会的促进价值,即便定性评价的难度大,也要努力去做,端正学风,坚决排除定性评价中个人友情、单位利益、门派冲突的种种阻力。

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,评审专家也难免受到各方面影响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苏新宁提出了他构想的学术信誉保障机制。

“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,评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,供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;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专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,也可以看到对其他被评审人的意见。”他补充道,“被评审人有权先匿名质疑,再公开对质。”

“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,可以及时将公认有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,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净。”苏新宁对记者说,“尤其是‘双一流’建设和近日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,更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建立学术公信力,必须久久为功。”

## 把中国论文写在中国期刊上

“SCI至上”的背后,还是中国自主优秀期刊的缺失。

苏新宁回忆,中国大陆引进SCI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,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,此后,南京大学在SCI发文连续7年、引用连续8年位列中国高校第一。

“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,期刊水平低,SCI甚

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,我们当时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,提升自己的影响力,但现在不一样了。”苏新宁说,“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,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。”

“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‘走出去’,现在是‘引进来’的时候了。”他认为,“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,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,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,不能以‘走向世界’‘国际化’为借口,把好东西送出去,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。”

近年,中国科协、财政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等部门已经提出“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”。苏新宁提出,中国期刊要有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志气,“不能只满足于在国内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,要办成《自然》《科学》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期刊群,让外国优秀成果争相发表在中国期刊上。”

他提出,要破解学术期刊企业化的深层问题。

“企业要生存,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,而不是怎么把学问做好。科研工作者本是为国家作贡献,结果不仅到数据库看文章要付费,自己写论文投给期刊还要付费,为什么‘中国知网’不能免费给中国人用,这样的模式对学术是一种伤害。”

苏新宁认为,部分学术资源数据库与学术期刊签署“独家协议”,导致同一领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,提高了图书馆等服务机构的经济成本,也不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学术动态。

他建议,要理顺学术成果发表的利益分配机制,科研项目资金中的版面费、资料费等项目不给个人,而是用于资助学术资源库和学术期刊,作为回报,这些学术资源库要免费向学者开放,学术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费。

“如此,期刊社和数据库不需要费心考虑生存问题,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学术品质。”苏新宁说。